

ENERGYUANYU CHONGTU

能源与冲突

〔美〕

斯坦利·布卢姆伯格
格温·欧文斯



原子能出版社



能 源 与 冲 突
爱德华·特勒的生平与时代

[美] S.A.布卢姆伯格
G. 欧 文 斯 著
华君铎 赵淑云 译

“原子能出版社”

能 源 与 冲 突

爱德华·特勒的生平与时代

[美] S·A·布卢姆伯格 著

G·欧 文 斯

华君铎 赵淑云

原子能出版社出版

(北京2108信箱)

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

北京宝林排版厂排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限国内发行)发行·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850×1168¹/₃₂·印张15.5·字数413千字

1986年6月北京第一版·1986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统一书号:15175·742

定价:3.15元

译者的话

本书系根据美国 G.P. Putnam's Sons 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Energy and Conflict: The Life and Times of Edward Teller 译出。

本书作者以美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的生平为线索，用丰富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原子弹和氢弹的构思和研制过程，披露了美国政界、军界和科学界内部在核武器上所发生的争论、矛盾和冲突。本书还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许多杰出科学家的成长过程，以及他们为探索科学真理而勤奋治学和互相合作的情景。书中不少材料对广大科技人员、研究美国的专业人员以及大、中学生均有参考和借鉴的价值。

由于作者在世界观方面的原因，政治观点是错误的，对一些史实的评述是歪曲了的，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不妥之处。这是我们在阅读时要注意的。

为压缩篇幅，译者对书中的某些部分作了删节。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4年于北京

目 录

导言	1
1. 少年时代.....	7
2. 黄金时代的始末.....	30
3. 量子跃迁.....	55
4. 加菲尔德路的一帮人.....	69
5. 悄悄谈论着的事情.....	85
6. 世界末日会到来吗.....	111
7. 装配线上的造反者.....	136
8. 突如其来的灾难.....	156
9. 氘、氚以及政治.....	179
10. 华盛顿的支持.....	224
11. 聚变和混乱.....	245
12. 在雾中竞赛.....	278
13. 悲剧的背景.....	318
14. 为奥本海默设下的圈套.....	342
15. 证人.....	366
16. 烦恼的岁月.....	391
17. 放射性落下灰的时代.....	411
18. 平静的局面没有出现.....	449

导 言

对于写传记的人来说，最难的事情莫过于要发现并写出主人公行事的思想动机。把事件和行动记录下来，只要你有非凡的耐心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就行；但要了解产生这些行动的复杂思想过程，那只有最高超的分析家才能胜任。

当然，传记作家通常并不都是分析家。而且，他们所写的对象大多数既无时间，也不愿意投入这一漫长费时的工作过程中去。

然而幸运的是，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个十分诚实和愿意合作的人。这并不是说，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全都得到了爽快的回答，事情并非如此。例如，在谈到爱德华·特勒早年的某些情况（他的家庭或他的童年）时，他就不大愿意谈论，有时甚至是拒绝说下去。有关这一方面的问题，他让我们去问他的姐姐、妈妈，或去问他以前的保姆。他不愿谈论这方面的事情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他同他家庭的联系是密切的，他同他父母的关系也很亲密，甚至可以说相互之间是很有感情的。

本书中的结论是经过了两年的采访之后才获得的。为了寻觅素材和了解情况，我们从耶路撒冷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兜了一大圈。

我们第一次见到爱德华·特勒是在1972年5月，地点在特拉维夫的谢拉顿饭店的台阶上，是我们的一位很讨人喜欢的老朋友舒拉·拉斯尼茨基指给我们看的。这次偶然的短暂相见后来产生了一种富有成果的关系。特勒这个人过去是，现在还是那种满脑子装着种种新奇思想的人。作为新闻记者的我们，感到非要把这种灵感的火花描绘出来奉献给公众不可。

我们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端量我们早先在画布上从另一角度描绘出来的特勒的形象。画象上原来黑白分明的线条渐渐地成了深

浅不同的灰色；原来看上去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四方方的形象，现在看起来却是一个具有曲线线条的圆形人像了，而且这是一个不断在发展的、饱受烦恼然而基本上还是诚实的人。

使我们感到意外的第一件事是，这个据说象猎奇博士*的人物在科学上竟然是反对实行保密制度的。更重要的是，他同科学上的开放主义结成的不解之缘并非出于一日之功，而是属于一种由幼年时代对科学的热爱转化而来的坚定信条。

我们两个人都是倾向自由派的，因此要理解特勒当前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倾向就更困难了。作为传记的作者，我们有义务写出他的思想动机，并对此进行解释。但是，我们同特勒在观点上不一定都是一致的。然而，通过收集本书的材料，我们同爱德华·特勒的政治分歧在距离上有所缩小，但是并没有消失——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了解新的情况，对于人的思想会产生一种奇特的影响；人们的观点是能够改变的。

1972年初秋，我们发现还没有人为爱德华·特勒写过传记，这使我们吃惊。特勒是世界上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但是没有一个作者发表过他的事迹。如果说他在建立一个强大美国的问题上不是唯一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鼓吹者的话，那么他在提倡美国强大方面也是作出了贡献的。但是，没有人对这位科学家的生平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我们为此责怪了他。不管怎么样，恩里科·费米已经有了传记，特勒的老朋友利奥·西拉德也有了传记。爱德华·特勒到底有什么问题呢？特勒说，有人曾经要他写自传，但他拒绝了。用特勒的话来说，自传是为自己服务的。另外，他也没有时间。

“然而，”特勒接着说，“如果你们想写我的传记，我可以向你们独家提供我所有的不属保密范围的文件和信件。”

这一令人高兴和慷慨的表示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于是，我们坦率地说：“特勒博士，你

*美国五十年代一部讽刺影片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也清楚，你的名声不大好，因此要找一家可靠的出版社来出这本书，可能是件难事。如果书写了出来只有右翼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一点当时我们判断错了），那就等于浪费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情况下，能看到这本书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它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也将是微乎其微的。”

特勒理解这一点。“你们说的可能完全正确，但我相信你们两位一定能找到克服这一困难的办法。如果你们决定撰写我的传记，我只要你们答应我一件事。”我们等着特勒说下去。“你们必须批评我，猛烈地批评我。”为什么呢？我们大声地把内心的疑问说了出来。显而易见，特勒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写出一本客观的书，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写的，不要把他写成一个“权威”的形象，不要避开他深刻的政治纠纷而去进行无血无肉的叙述。我们答应将如实地把情况反映出来。

我们同他说定，我们将拥有完全的编纂自由。我们将不让他看我们的底稿，至少要等清样排出以后才给他一阅。这里唯一的例外是，某些科学材料须请他审阅以求准确；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科学材料都经他看过，因此书内如有不确之处，负责任的应是本书作者。然而要说明的是：我们承蒙著名的科学家审阅了本书的科学部分。

我们向特勒要了一份他的朋友和批评者的名单。他很高兴地把名字给了我们。特勒自言自语地说：“很可惜，你们不能同奥本海默谈话了〔他在1967年去世了〕，他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

这次谈话大部分是在从杜勒斯机场到旅馆的四十五分钟汽车路程上进行的。这家旅馆在华盛顿市格雷亨公共汽车终点站的斜对面。那是一家很低级的旅馆，特勒在华盛顿时常常住在第四流的旅馆里。后来我们发现，特勒这样作只是因为付不起更高的费用而并不是喜欢同别人合用公共卫生间。政府给他的每日出差补助是很少的。

特勒在旅馆所住的房间很小。由于家俱和墙上都沾满了灰尘，

屋内可用的面积就更小了。当我们走进那间散发着霉味的小卧室时，特勒一拐一拐地绕着床边走过来给正在伯克利的米茜·特勒打电话。

我们以前在特拉维夫见过爱德华的夫人。这个身材不高但体格健壮、精神饱满的女人似乎将她的时间全花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和为其爱夫健康操心这两件事情之上。特勒不但过于肥胖，而且胃口还特别好，因此他的消化系统无法适应。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米茜不让她丈夫吃巧克力点心，但是怎么说也劝他不住。每当特勒不能节制饮食而引起疾病时，米茜就只好当起女看护来。

但在华盛顿的这天晚上，特勒却很愿意让米茜也快些知道这个消息。他在称呼她时用了昵称，还用匈牙利文说了一些亲热的话。之后，他说道：“斯坦利和格温要为我写传记呢。”那边接电话的人似乎有感到意外和担心的表示。后来我们了解到，米茜不想再提那些伤心的事；再说，这两个自称是自由派的作者到底会表现出多大的客观性呢？她丈夫曾经遭到报刊的嘲笑，为什么还要去拨弄是非、自找麻烦呢？

然而，后来起积极作用的也许是这一种想法：一切的一切就看作者的品德了。历史可能会为特勒某些受人指责的行动申辩，至少对这些行动会进行解释。过些年以后，调查研究可能会揭示出一些事情的真相，而这些真相会有助于旧伤痕的愈合。

特勒没有听从米茜要谨慎从事、自我抑制的告诫。他决定大胆地进行尝试。他至少认为，他过去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出于自己的信念的，也许有时候他在判断问题时犯了错误；但即使这样，它们也是诚实的错误。因此，这些事情都可以写下来。他愿意合作，让我们去采访他，后来我们发现他为采访而花的时间竟达到几百小时之多。

特勒向我们提供了不属于保密范围的来往信件。他在利弗莫尔的秘书奥利维特·钦帮助我们利弗莫尔和洛斯阿拉莫斯的文

件中找出了早被忘却了的材料。

令人不快的保密限制是作者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有一些科学家不愿敞开谈论他们的工作，他们担心会违反保密规定——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连什么材料仍属保密范围也不知道。其他的科学家并不象他们那样感到拘束。

能源研究和发展署(前身是原子能委员会)帮助我们澄清了一些明显的矛盾之处。由于一些保密材料陆续不断地被解密，因此在写本书的过程中有的材料从保密中解放了出来，然而，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有某些材料在过了二十五年以后仍旧列在保密范围。有些事件的保密级别非常之高，甚至连原子能委员会都不了解；这使撰写这一时期历史的工作更加复杂了。

我们拿了一些证明材料去询问原子能委员会历史首席编写者理查德·休利特。这些材料证明，苏联人在美国热核反应试验以前已经进行了热核反应。那时候，由美国空军、国务卿和总统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是了解这一情况的。当时，特勒对于地球上能否进行热核反应并无把握，但他承担着研制氢弹的主要职责。然而，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特勒对苏联人成功地进行了热核反应这一情况却一点也不了解。休利特的回答是：“这同保密制度无关。至于苏联首先进行热核试验，我压根儿就没听说过。”

直到1975年初，特勒才从本书作者那里了解到了苏联在热核领域早就领先的情况。

特勒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带着感情说：“我一直跟你们说，我认为科学上的保密制度有害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对苏联人保密并没有成功，被封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关于刚才你们说到的那件事，我当然‘有知道的必要’。我当时正在搞研究吆！”我们说，在这种问题上对他实行保密是有罪的。特勒不赞成我们这种尖刻的说法，他说：“当然，那是不负责任的。”

尽管特勒对保密制度十分厌恶，但是他遵守规定。好几次我们向他提出问题，他的回答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涉及到保密材

料，但特勒总是说：“能否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没有把握。请把问题写下来，让我去问一下保密人员看能否作出回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本书作者的询问都得到了积极的考虑和回答。

有时候，原子能委员会的记载同我们采访的科学家的回忆颇有出入。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把两种说法都写入书内。

从广义上说，爱德华·特勒的一生是理论物理学家、应用科学家和政治人物的一生。尽管理论物理过去是、现在还是他最喜欢的专业，但是他感到不能不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应用科学。最初，那是出于设计武器的需要；后来在最近几年中，他参加到探索替代能源的工作中去了。

他工作重点的这一变化，是在他进入了政治舞台以后发生的。这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这方面的科研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决定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政治决定。在特勒的事业中，曾经出现过几次扣人心弦的插曲；其中一个插曲就是他促使杜鲁门总统决定制造氢弹的那些政治活动。

特勒一直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为人们争议着的人物。然而，作为传记作者的我们，却面临着天体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的难题：由于空间与时间的关系以及光的性能，我们只能看到过去，而永远看不到现在。

1. 少年时代

“在所有重大的事情上，他都是一个危险人物……我确实感到，要是没有特勒，这个世界会比现在好。”这个看法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物理学家拉比在1973年会见本书作者时发表的。这一评价并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政治性的。在另一个侧面，一位同样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尤金·维格纳对我们说，特勒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富有想像力的。你知道，我认识爱因斯坦，因此我这么说是很有份量的。”然而，向我们作出最高评价的要算是纳尔逊·洛克菲勒副总统了。“很难得，”洛克菲勒对我们说，“我遇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的活力和献身精神以及他们的才能是如此出众，使我难以忘怀。我永远感激他们为人类所作出的贡献。亨利·基辛格是这样的人，另一个就是爱德华·特勒博士。”

这就是对这位匈牙利移民所作的各种评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这个匈牙利移民已经成为本世纪最有名望、同时也是最引起争议的物理学家之一。特勒是一个热情而沉思的人，同他在一起既令人愉快又使人得益。关于他在科学上的能力，没有什么可以受人非议的地方。但在实现其科学目的的政治方面，他就像一个在舞台上谢幕的演员一样，面对着一群意见不同的观众：有些人将他作为正面人物来欢呼，另一些人则把他当作反面人物加以嘲笑。

可以看一看，197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激进的左翼学生把特勒称为“战犯”。他们游行到特勒家要焚烧他的住宅，结果被伯克利的警察阻拦住了。1972年，全国各地崇拜特勒的人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创立了一个以特勒的名字命名的研究生中心。后来，特

勒同这个中心脱离了关系；这只能说明他这个人的复杂性以及他内心的混乱。实际上，混乱——无论是他周围的还是他内心的——一直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中所遇到的东西。他相对稳定的年代只包括六年的童年时代，也许还包括他青年时代后期一个很短的时期。

1914年8月，炮声开始响彻欧洲。这时特勒六岁。虽然他已是一个很不一般的少年，但是毕竟还小，自然不会了解将要来临的巨大灾难。在这一时期，他常常躺在布达佩斯一座简陋公寓内的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就用数数的办法来使自己入睡。

“一分钟是六十秒，一小时是三千六百秒，一天便是八万六千四百秒，……”也许还得往下数。用心算法来进行复杂的数学计算，对他来说纯粹是一种快乐。

在欧洲的宫廷和作战办公室里，残酷、可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役正在策划之中。可悲的是，部长们和将军们一点也不了解：他们的行动将在本世纪产生难以消除的虚无主义的势力。在特勒一生的各个阶段，他常常遇到这种势力，最终往往是他的才能使虚无主义的势力转到了新的方向。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令人比较愉快的匈牙利时代结束了。那个时代是1867年开始的。那一年奥地利帝国在哈普斯堡的统治者对他们匈牙利臣民的民族主义屈服了。该帝国分成奥匈二元帝国。弗兰茨·约瑟夫成为奥地利的皇帝，同时也是匈牙利的国王。在内部事务方面，匈牙利人在理论上获得了独立。但是，马扎尔人土地上的和平时期的却没有超过半个世纪。匈牙利就象它的儿子特勒一样，常常陷于动乱之中。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地理上的巧合：马扎尔民族的西边是强大的日耳曼族，东边是强大的斯拉夫族，马扎尔族正夹在其中。在早先的年代，他们还遭受到从南边来的到处行劫的土耳其人的侵袭。

1914年，在匈牙利人直接统治下的民族不仅包括马扎尔人，而且还有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

和许多其他民族。在匈牙利的少数民族，除了犹太人之外，都怀有民族野心。只是由于布达佩斯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加上当时还存在着对以年迈的约瑟夫为化身的哈普斯堡的忠诚，奥匈帝国中的匈牙利部分才没有分裂。但到后来，无论是经济还是传统方面的因素都抵挡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煽动起来的民族狂热。

布达佩斯（实际上是布达和佩斯两个姐妹城）座落在曲曲弯弯、流经好几个国家的多瑙河的河畔。到1914年，官僚权力和经济力量已经集中在布达佩斯，它已具有位于它西边的典型的欧洲各国首都所特有的壮观。布达佩斯带有这些西方特点并不是偶然的。受过教育的匈牙利人崇拜西方文明——特别是德国文明——的精神和实质。布达佩斯模仿维也纳，模仿得还很成功。

然而，在匈牙利的内部结构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许多世纪以来，匈牙利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领导权都掌握在拥有土地的贵族手中，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一些开明的温情主义者就来自这仅占人口百分之五的人中。匈牙利本质上仍是封建的。种田的农民在1848年以后名义上从农奴制度下解放了出来，但到了二十世纪他们还是无权，还是遭受压迫。

历史的安排是奇妙的。爱德华·特勒在布达佩斯知识界的出现，同贵族不愿屈从社会变化这一点是直接有关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商业蓬勃地发展起来，这就需要有大量受过教育的专门人材和办事人员。被压迫的农民既然出不了这些人材，真空就由德奥人和犹太人这两个少数民族来填补了。他们的文化传统使他们能够胜任那些任务。

德奥人是奥匈帝国内的匈牙利人。他们从事匈牙利的商业工作是人们意料之中的。犹太人——包括特勒的先辈——所经历的历史变化却是不寻常的。在马扎尔人统治下，一小部分犹太人曾经在匈牙利居住了许多世纪。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邻近的国家——特别是波兰和罗马尼亚——出现了反犹太人的高压，更多的犹太人被迫跑到了从传统上来说比较友好的匈牙利的境内。犹

犹太人根据历史上希伯莱的做法，总喜欢保留其文化和宗教传统的核心部分。但是，他们中有很多人匈牙利十分忠诚，很容易同社会环境融合在一起。在1848年大爱国主义者拉乔斯·科苏特领导的民族起义中，犹太人甘心情愿为马扎尔人的事业而战斗，因而赢得了匈牙利人的尊敬。

1850年到1914年间，犹太人口的增长特别显著。1850年，匈牙利大约有三十五万犹太人。到1914年，犹太人在二千万的总人口中已增加到了一百万左右。虽然这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但是犹太人在专门人材中所占的比例很高，这表明他们具有高度的才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犹太人占记者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占私人开业医生人数的一半以上。而在律师中，大约有一半是犹太人。

在这些律师中，有一个叫马克斯·特勒。有志的年轻人都向往去城市寻找机会，马克斯也是一样。他到布达佩斯学习法律，希望做一名律师。他出生在匈牙利摩拉维亚地区一个名叫爱尔塞库瓦的小城镇。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特里亚农条约把这个地区割让给了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斯·特勒在波兹索尼（当地的主要民族德国人称之为普雷斯堡）的匈牙利城市里上了中学。这个城市后来割让给了捷克人，捷克人称它为布拉迪斯拉发。

马克斯在学法律的时候，他的父母都去世了。他的性格似乎是在信念和怀疑两者奇妙的结合中形成的。当他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得法学学位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律师需要比我目前勉强谋生的手段更好的武器。”然而，他承担了培养他三个妹妹的责任，成功地开办了律师事务所。他单身汉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三个妹妹结婚。直到这个时候，他也许才让自己进行恋爱。

1904年1月15日，三十二岁的特勒在布达佩斯一个朋友家里遇见了伊洛娜·多伊奇。她年方二十四，差不多有五英尺高，身材苗条，满头的金发，显得很动人，一双敏锐的蓝眼睛，眉宇之间显露出十分坚定的神情，热情洋溢。她已经是一个接近专业水平的

钢琴演奏者。除能讲匈牙利语外，她还能说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1月17日，马克斯在他的日记中悄悄地倾吐了他的希望：

现在，我可能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对象。如果眼睛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灵魂，那么她就是善良和温柔的化身。她象小鹿一样的羞怯。见面才五分钟，我就感到我们似乎早已相识。在我离开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永不分离。离别她后，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她不在时，我的思维都静止了。

马克斯想在风度和美貌上同她相配，那是没有希望的。他个儿矮小，微胖，拉小提琴也只不过是二流水平。在当时以及后来认识马克斯的人对他经常使用的形容词是“文雅”。但是，他在事业上的成功似乎表明他还有内在的力量和见识。其实，他在浪漫的日记里对伊洛娜的评价也不是很准确的。她并不像“小鹿那样的羞怯”，而是具有很坚强的意志。总之，他们性格的混合使彼此吸引在一起了。2月1日——见面后才十六天——他们订婚了。1904年5月29日，他们结了婚。

伊洛娜的父亲伊格内克·多伊奇对马克斯的品行当然给予了认真的考虑。他本人是一个能干的银行家，生意做得不错，在匈牙利东部的卢戈斯市还开了一家棉纺厂。他是一个既胖又黑的人，前额宽阔，眉毛很浓。伊洛娜的性格、前额以及眉毛都像她的父亲。但是其他娇俏的地方——包括那双清冽晶莹的蓝眼睛——却是从她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

马克斯·特勒和他岳父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犹太人，大家都融合到那个大社会里面了。除了在举行正式仪式的时候（马克斯和伊洛娜的主婚人是卢戈斯市的犹太首席法学博士），他们很少谈及自己的祖籍。他们都在文化传统方面都倾向德国。多伊奇一家往往都说德语，这同他们的姓也正好呼应起来，因为“多伊奇”（Deutsch）的意思就是德语。这个姓也可能说明，他们的祖辈是从德国迁移出来的。

这一对新婚夫妇不得不在马克斯办理律师事务的布达佩斯居住下来。但在以后的若干年里，多伊奇在较远的卢戈斯市的住处成为他们僻静的避暑之地和第二个家。多伊奇家的人住在一个大公寓楼里，楼下是城市大广场的几家商店。从公寓楼的晒台上可以看到广场，每天，多伊奇家的人都喜欢在那里观看广场上市镇居民随便游逛和买东西的热闹场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马克斯的家乡后来被割让给捷克人一样，卢戈斯市在战后的特里亚农条约中也被划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

马克斯·特勒夫妇在戈罗夫街三号挑选了一套房间。这里离位于多瑙河佩斯一边的布达佩斯法院和政府机构很近。这套房间中有一间用来作为马克斯的法律事务所。1905年11月11日，他们第一个孩子埃米出生了。马克斯很为她感到骄傲，她同她母亲伊洛娜一样也有一双蓝色的眼睛。马克斯以惊人的耐性承担了做父亲的责任，而伊洛娜对于小埃米的安适却是愁个没完。有一次，马克斯不得不说话了：如果她有十二个孩子，也许就不会对谁都犯这么大的愁了。

1908年1月15日，即埃米生下后的两年又两个月，爱德华·特勒*出生了。就在爱德华出生前的几个星期，怀着沉重身子的伊洛娜同一个朋友在佩斯附近的公园里散步。她似乎对公园的各个角落及其景色怀有异乎寻常的兴趣。她的朋友感到十分奇怪，于是向她提出了疑问。伊洛娜说：“此时我有一种感觉：我将生一个儿子；我还相信，他将来定会出名。所以我正在为他今后的纪念碑寻找最好的地点。”也许，伊洛娜在开一个小小的玩笑，但是如果有人怀疑这个孕妇的预言，那么他就象在凌辱神灵一样。

三年过去了。小爱德华唯一出众的地方是他还不会说一个连

*实际上，特勒的父母给他们第一个儿子取名为埃达（爱德华在匈牙利文中叫埃达）。1926年在爱德华·特勒去德国读书时，才用了德文和英文中的叫法——爱德华。